

【学界往事】

□苍耳

鹦哥不吃菠菜

胡文和瞿文对鹦鹉的态度是一正一反，褒贬鲜明。应该承认，瞿秋白这一观点背后有陈独秀的影子以及整个左翼阵营的影子。

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一则因“鹦鹉”而起的“公案”，曾引发两派知识分子的激烈争鸣。这则公案也折射出古今对鹦哥态度之不同。胡适先生在《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一文中，引用了印度佛经里的一段神话：有一只鹦鹉，飞过雪山，遇见雪山大火，它便飞到水上，垂下翅膀，沾了两翅的水，飞去滴在火焰上。雪山的大神看它往上来滴水救火，对它说道：你那翅膀上的几滴水怎么救得了这一山的大火呢？你歇歇吧！鹦鹉回答道：我曾住过这山，现在见山烧火，心里有点不忍，所以想尽一点力。山神听了，感它的诚意，遂用神力把火救熄了。

胡适是借这个典故以自比或自喻，要学鹦哥用双翅滴水救火。他说，创办《新月》这个刊物，只因为这些人骨头烧成灰都是中国人，在国家吃紧的关头，心里有点不忍，所以想尽一点力。因为近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在“训政”的旗帜之下，在“维持共信”的口号之下，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受到种种钳制。异己便是反动，批评便是反革命。报纸的新闻和出版自由至今还受检查。稍不如意，轻的便是停止邮寄，重的便是封闭。所以，今天全国之大，无一家报刊杂志敢于有翔实的记载或善意的批

评。他尖锐地指出：一个国家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和丑诋——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这都是摧残言论出版自由的当然结果。

最先撰文嘲讽胡适的是瞿秋白。他在《鹦哥儿》一文中含沙射影地暗讽道：胡适之先生整理国故的结果，发现了它还会救火，这倒是个新发现的新大陆。话呢，的确不错：现在的鹦哥儿都会救火了。第一，因为新大陆是鹦哥儿侨居过的，所以新大陆要有大火的话，它一定要去救。第二，鹦哥儿的“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因此，中国正在大火，鹦哥儿也一定要来救的。瞿秋白批评胡适是他的权利，没有什么不可以。问题是，秋白先生不该歪曲印度佛经故事，将“滴水救火”扭曲成“用自己的花言巧语来救火”。由此他也避开了正面批驳胡文，却避实就虚地绕到后面“打棍子”：中国的鹦哥儿现在也学着法国资产阶级，牺牲了自己的人权论的政见，也主张来这么一个国防政府。中国的鹦哥儿就会这样学嘴学舌地救火。他们要救火的诚心，他们要救中国绅商统治以及国际帝国主义统治的诚心，是值得感激的！最后他讽刺道：花言巧语的鹦哥儿，你们的“人权”、“自由”

还要骗谁呢？鹦哥儿啊鹦哥儿！你们还不如兔儿爷。兔儿爷有一种特别的骗人的本事！它们遇见什么危险的时候，立刻用两条小巧的前腿，把自己的很美丽的红眼睛遮起来。

胡文和瞿文对鹦鹉的态度是一正一反，褒贬鲜明。应该承认，瞿秋白这一观点背后有陈独秀的影子以及整个左翼阵营的影子。在此之前，胡、陈两位老友围绕一场“大火”，发生了“水火不容”的尖锐对峙，几近绝交。1925年底，《晨报》馆被群众焚毁。陈独秀认为烧得应该，并反问胡适：“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胡适写了一封长信给陈独秀，措辞严厉地说：几十个暴动分子围攻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此事不以为非，反以为是，这态度很使我感到诧异。胡适主张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凡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胡适如此苦口婆心，不过是在重复五年前他与陈独秀等人共同发起的《争自由宣言》，希望“此火”以后不要再“烧”了。

无独有偶，鲁迅在《谈皇帝》一文中，也谈到“红嘴绿鹦

哥”——那是菠菜在民间的奇怪别名，是专门用来对付皇帝的。他说家中曾有一个老仆妇，她曾说——皇帝是很可怕的。他坐在龙位上，一不高兴，就要杀人，不容易对付的。所以吃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譬如一年到头给他吃菠菜，一要就有，毫不为难。但是倘说是菠菜，他又要生气的，要杀人。因为这是便宜货，对他就不能称菠菜，而得另起一个名字，叫做“红嘴绿鹦哥”。

“愚妇”们用“愚君”的办法来对付皇帝的“愚民”，看起来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了。但刀把子无论如何还是操在“愚君”手里的，而且他是吃惯了这“红嘴绿鹦哥”的。

不过，笔者没听说过鹦哥儿吃菠菜的。没听说也不打紧，孤陋寡闻嘛，又何尝妨碍鹦哥儿被做成一道菜，一道“名”菜呢？可以设想：有一天皇帝想起这美味，便让御厨做。结果御厨杀了几只红嘴绿鹦哥，皇帝吃后感觉味道不对，这哪有菠菜的滋味？于是一怒之下杀了御厨。说白了，文人的勇毅在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悲哀在于“御膳房”里做菜，免不了要出差错的，这就有杀头之虞。倘直言那“红嘴绿鹦哥”原本就是菠菜，恐怕更要坐牢杀头了。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



【名家背景】

浙大校长竺可桢

□叶兆言

全球变暖是时髦话题，成了要环保的重要依据。然而竺可桢却用一张曲线图，向我们形象地展示了地球表面的温度变化。具体地说，在唐朝，地球相当温暖，那年头黄河流域的气温，与今天的长江流域不相上下。以梅花为例，它虽然傲雪斗霜，并不耐寒。到了宋朝，地球突然变冷，黄河流域的温度急剧下降，梅花难以生存，于是形成了“不知梅”的现实，王安石便曾讥笑北方人分不清梅花和杏花。

根据竺可桢的温度曲线图，今天的平均气温，已接近唐朝，而历史上最冷的年代，在北宋。同时，曲线还告诉我们，气温的冷热变化，不一定是个缓慢过程，它像股票一样，一会儿牛市，一会儿熊市，突然跳水也是常态。气温变化与干旱洪涝有密切关系，许多疑问我们还不能解释，轻易就下结论，很可能会有严重后果。

竺可桢后来屡屡被人提到，当然不是由于气象学，更重要的原因是当过十多年的浙江大学校长。中国是个重教育的国度，在解放前，当上县中学的一校之长，基本上跟县太爷差不多。不平常的年代，当上著名大学的校长，那是非常的不平常。现如今的部级高校领导任命，据说也要经过政治局讨论，因此校长一职的被看重，不仅是传统，而且现在仍然延续。

抗战胜利，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打电话给赵元任，希望他回国出任中央大校长，赵很潇洒地回电：“干不了，谢谢。”北京大学的校长则由胡适担任，考虑到他是老好人，号称“大炮”的傅斯年先代校长，对原有教职员大加整顿，用傅的话说，是替胡“清君侧”。

竺可桢担当浙大校长是在抗战前一年，当时他在南京定居，为要不要当这个校长十分犹豫。读《竺可桢日记》，记忆最深的总是赶来赶去，每周在杭州待几天，在南京住几天。他详细记录了路上需要的时间，当时宁杭国道比较好走，半天也就到了。

如果不是抗战，这校长未必当得长，一开始只想顶替一阵，可是抗战爆发，他不得不挺身而出，带着学校西迁，结果成了浙大校史上最重大的一位校长，干了十三年。他当校长的口碑极好，查民国年间的大学，学生极难侍候，学潮一个接着一个，当校长能一口气干这么多年，恐怕也是绝无仅有。

行政工作会影响做学问，不言而喻。胡适的著作，常常写了上本没下本，显然与太多兼职有关。凡事都有得失，竺可桢当了多年的大学校长，科研水平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往事如烟】

□刘增人

见证沧桑的“荒岛书店”

八十年前，这里是一家书店。大概因为当时的青岛，文化事业相对滞后，店主主人以为是在披荆斩棘，故名“荒岛书店”。



这张照片是笔者2006年拍摄的。这家奶站位于青岛市市南区广西路4-6号，是广西路、路口路、龙江路的交界处。每天清晨，取奶的人络绎不绝，到下午就少有人光顾。它像所有奶站一样忙碌并清闲，也像所有奶站一样单调而有益。

八十年前，这里是一家书店。大概因为当时的青岛，文化事业相对滞后，店主主人以为是在披荆斩棘，故名“荒岛书店”。据传说，书店的主人是孙乐文和宁推之。孙后来加入了共产党，这书店也就成为地下党以及青岛“左联”小组的活动地点之一。书店门脸不大，因为常常摆着上海、北京等地出版的新文学书刊，在那时的青岛，是非常独特、新鲜的，由此引来不少对新文学情有独钟的年轻读者，就非常自然。书店主人还在店内摆了几张座椅，供选书、买书或者不过随便走来偶尔驻足的人们少事休憩，翻阅浏览，或者与同道者们议论交流，互通信息——这是书店主人与其他商人明显的差别，而与上海的内山书店的做法略微近似。据说当时在市立中学读书、后来成为著名电影艺术家的黄宗江，后来成为新华社副社长的李前管（改名为李普），上世纪30年代文坛著名的东北夫妇作家“两萧”，都先后作为荒岛书店的“常务”读者，在这里相识，在这里订交，成为以新文学为媒介的同志兼朋友。

1934年初夏，萧红、萧军应朋友舒群的邀约，从哈尔滨经大连来到青岛。那时的青岛，日寇侵略亡国灭种的威胁尚未逼近，以国立山东大学为中心的教育、文化事业，依然在顽强地建设发展，海风依旧清新，海浪照样迷人，是文化人不错的游览或寓居的选择。老舍与洪深，是大体上同时来到青岛，与原先就定居于此的王统照等共同

组成了一个无论是实力还是规模都足以令人瞩目的新文学群体。他们携手创办《避暑录话》等刊物发布自己的新作，他们在寓所或酒馆时或小聚，畅谈快饮，借以吐露心中的淤积块垒，不经意间，造就了青岛历史上一段堪称辉煌的文化。“两萧”来到青岛后，虽然没有足够的史实确证其已经加入这一群体的文化活动，但接受了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则是大体上可以断言的。在这里，他们由于生活与工作的相对安定，创作开始出现了高潮。受胎于哈尔滨的两部小说，即后来定名为《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者，在这合适的气候下迅速成熟，完成了酝酿已久的初稿。作为名不见经传的两个文学青年，写出作品固然困难重重，谋求出版就更是如入蜀道，难上加难！还是在这荒岛书店，孙乐文建议他们不妨向上海的鲁迅先生求助。因为孙在上海的内山书店见到过鲁迅先生，和蔼可亲之状，时时如在目前。也许是受到孙的鼓励，也许是为鲁迅的崇高盛誉吸引，也许是当时“两萧”实在也没有更为可行的办法，于是他们毅然把自己的

心愿寄往向往已久的上海。孙乐文还建议他们把通信地址就署为青岛荒岛书店，万一不测，“两萧”不会有啥危险。而他作为书店的主人，也能够轻松地“推脱”责任。于是，这满载着两位即将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上大放异彩的青年作家的希望的邮件，从黄海之滨，飞向了中国新文学的中心上海，飞向了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大师鲁迅。

以后的事态发展，就几乎是尽人皆知了：当“两萧”正在满心里惴惴不安的时候，鲁迅的来信到了，他们的欢欣鼓舞，自然是不想可见的！鲁迅在信中说：“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有工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子可以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最好是挂号，以免遗失。”信写于1934年10月9日夜，这是“两萧”命运转折的节日，也是他们和鲁迅通信以至结识的开始。从此，他们在鲁迅的关心提携下，不但出版了自己的成名作，而且迅速跃居为上世纪3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青年小说家，成为在抗日烽火燃遍关内的历史时刻奋力充当民族代言人的东北

作家群的杰出代表！此后，他们的作品特别是萧红的《生死场》以及萧红的悲剧性人生历程，更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异常广阔的阐释空间。

于是，这一幢并不起眼的普通房子，在历史的特殊关头，成功地扮演了青岛“文化港口”的重要角色，成为人们屡屡称道的文化佳话的关键与载体。从书店到奶站，它的历史地位发生着巨大的改变，风雨沧桑，见证着几十年间青岛的、中国的天翻地覆！该店出面执掌历史风旗的时刻，它当仁不让，走出显赫，走出荣耀；当历史变异形势苍黄，它又谦逊质朴地走向民间，走向生活，在历史进展的链条上尽职尽责地完成着需要它完成的各项职能。好像是鲁迅说过：人，无非都是进化的链条上的一环，承着过去，向着将来；又无非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一朵浪花，在阳光下闪烁翻腾一度，发挥出自身的灿烂光耀以后，就无怨无悔地偕同诸多水滴诸多浪花一道，欢欣喜悦地顺着河床流向远方，流向大海……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青岛大学教授)